

【中医多学科研究】

明清之际中医海外传播概述*

王为群,周俊兵,王银泉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 210029)

摘要: 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西方科学的同时,也将西方医学和中医进行了交流。虽然中医的内容不尽系统,但由于个人研究和体验,但对于中医国际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故依托传教士在中国所著等书,通过归纳和整理对这一历史时期中医的海外传播途径、内容及意义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 明清; 中医; 海外传播;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R222.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14) 07-0914-02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经历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已为实践证明为一门有效的临床医学。随着世界科技、文化交流日益繁荣,中医学也越来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追溯中医海外传播历史我们发现,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中国开展科学考察活动,主要包括对天文、地理、气象及动植物、药物、中医和矿业的研究,通过文献资料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其中对中医的海外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传播的主要途径

1.1 翻译中医典籍

西方传教士在研究中国科技文化的同时,对中医学产生了很大兴趣,并对一些医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将这些医学典籍翻译后介绍到西方,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Michel Boym, 1612~1659)根据魏晋时期著名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翻译而成的《中医脉诀》被称为“中国医书被翻译成西文之始”。法国耶稣会士赫苍壁(Julien-Placide Herieu, 1671~1746)译有《脉诀》,又称《中国医法举例》或《中国医术简要》,译自宋·《图注脉诀辨真》。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把中国宋代法医学著作《洗冤录》译成了欧洲文字。

1.2 通过书信介绍

耶稣会士们以书信形式向国外介绍中医,甚至对西方人士的错误认识进行纠偏。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康熙年间来到中国,针对当时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对中国科学水平的偏见乃至轻视,在1730年8月11日于北京写给德梅朗的信中介绍说“中国

人的古代大师们都懂得,血液是通过全身而流动的,这种流动是通过‘经络’的血管而完成的,‘经络’即那些动脉和静脉网络。^[1]”

1.3 撰写中医著作

传教士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学习和体验,撰写了有关中医论著,详细介绍了有关中医知识,典型代表是卜弥格。在1652年9月卜弥格撰写的《中国概述》一书中介绍了通过把脉来诊断疾病的艺术,谈到脉诊不仅能使人决定疾病的类型,还能预测疾病的未来发展和结果。他还撰写了《中国药物标本》,收录中药若干种,并附木版、铜版插图,1682年出版后曾引起欧洲文化界的注意,此书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另外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介绍,卜弥格还著有许多未刊著作,其中包括中医独有的诊脉术。

2 传播的主要内容

2.1 中医诊断学的介绍

中医诊断学是中医学基础内容之一,是诊察病情、判断病种、辨别证候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传教士们将中医诊断学的脉诊、舌诊等作为重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法国耶稣会士赫苍壁的译著《脉诀》,内容就有“论脉博”、“按脉要诀”、“看舌苔色译诊断疾病法”附图像,以及“学习上述医术的纲要”。根据《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介绍,卜弥格的《中医脉诀》内容包括从汉文书籍翻译的脉诊四卷,舌色苔特征及金木五行论病症^[2]。法国杜赫德神父根据传教士寄回欧洲的各种材料编写成四大卷《中国及鞑靼中国地理、历史、王朝、政治情况全志》,其中第三卷翻译了《本草纲目》等古典医籍,卷首为中医诊脉图。

2.2 中药学的介绍

中药的运用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及理论精髓之一,传教士们为之非常感兴趣,在许多译著中介绍了植物药和动物药,其中包括中草药的产地、药性、功效和加工炮制。从文献资料看,一是参考当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及其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10BZX029)

作者简介: 王为群(1966-),女,OP人,副研究员,医学博士,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

的古典医著为基础,二是根据自己在中国的实地考察和研究进行整理介绍。

如杜赫德《中国及鞑靼中国地理、历史、王朝、政治情况全志》第三卷翻译了《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陶弘景本草》等部分内容,书中介绍了阿胶、五倍子的用途,记述了人参、茶、海马、麝香、冬虫夏草以及云贵川的大黄、当归、白腊虫、乌柏树等中药。此书1735年在巴黎出版,不久便被译成英文和德文,在西欧颇有影响。

又如冬虫夏草是整个中国医学药典中最有价值的药用真菌。清代医药学家汪昂的《本草备要》和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都对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进行了详细记载。冬虫夏草的神奇药效让来华的耶稣会士大为惊叹,巴多明神父就曾研究过此药草。他在1723年致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第二封信中,首先把冬虫夏草的药用功效和人参作了比较,指出冬虫夏草“具有大致与人参相似的功效,不同的是经常服用不会像人参那样引起出血,它能增强和恢复因劳累过度或久病而失去的体力”,同时讲述了其亲身体会^[3]。在这封信中还详细介绍了中药材大黄加工纯大黄饮片的过程,记载了大黄的取材、米酒泡软切成薄片、隔水蒸8h后晒干且重复2次,“至此才算把大黄加工完毕,这时它变成了黑色,磨碎后即可制作催泻丸药”^[3]。另外,在书信中巴多明介绍了中药的功效,对于阿胶他说道“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并使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健全肠道的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尿等”,“阿胶是慢性药,需长期服用,它可与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有时也可以用其粉末——不过这种情况较少”^[3]。

2.3 中医临床学的介绍

耶稣会士们对中医的认知、认同更多是来源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临床治疗,尤其是中医在西方医学面临的难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治疗手段、方法和疗效。

巴多明给法兰西科学院诸位先生的信中,介绍了中国医生用加工过的双倍剂量大黄煎剂加蜂蜜治疗一位因严重便秘而生命垂危的传教士,最终解除了病人痛苦的经历^[3]。

18世纪,欧洲对性病的治疗仍然是一个难题,因此他们一直想通过来华耶稣会士打听中医治疗性病的方法。巴多明在给圣彼得堡科学家的一封信中,答复了关于中医治疗性病的问题,并寄去了两种配方的药物,详细介绍了所用的药物和煎制方法。法国国王御医、法兰西皇家学院医学院教授阿斯特吕克是欧洲第一位把中国性病知识写进医书的医学家。1740年,他的9卷本《性病论》出版,其中有30页(共分六节)的篇幅谈到了中医的性病知识,主要

讨论了性病(梅毒)的起源、名称、性质、治疗、中西医的比较等。阿斯特吕克的结论中包括了巴多明提供的信息:中国在15世纪已认识梅毒、性病的症状及控制方法、性病的预防方法,包括含汞疗法,最后阿斯特吕克对中国的治疗方法作了评价。阿斯特吕克的书在当时影响很大,经多次修订,除拉丁文版之外还有法文版。阿斯特吕克对中国的性病知识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欧洲惟一有关中国性病材料,因此我把它刊布出来,以供好奇者。”^[4]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书信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的人痘接种法,而当时欧洲人对此尚一无所知,伏尔泰1726年在《哲学通信》中专门谈到中国人种痘的方法就是受到了耶稣会士寄回欧洲书信和科学考察报告的影响^[4]。

3 传播的时代意义

3.1 揭示疾病治疗的新前景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基础理论体系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日趋完整和成熟。通过耶稣会士们对中医独特理论、手段和方法的传播,进一步向世界介绍了中医在治疗疾病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引起了当时西方国家的重视,在战胜疾病、保证人们身心健康方面向西方人士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巴多明曾向中国医生请教,并参考《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在1723年5月1日致法兰西科学院的报告中,向西方介绍中草药冬虫夏草、三七、大黄、当归以及中国特有的药草和植物等,其中还详细介绍了这些中草药的形态、制作方法和医学功效,并把样品寄往法国,在法国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法国科学院于1726年为讨论这几种中药材,专门举行了一次报告会^[5]。

3.2 展示中医发展的成就

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不仅具有渊博的科学知识,而且学贯中西,学习和掌握了中国语言文字,体验了中医的奇妙,将所了解的古典医著进行翻译,其中不乏在中医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且具有较高医学价值的古典医籍。这些著作有的是医家长期临证实践中积累的丰富治疗经验和独特方法的临床著作,有的是在继承和总结前人本草学基础上,经过长期学习、实践和钻研编著而成的药类著作。如《洗冤录》是宋代法医学大家宋慈写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脉诀》是宋·崔嘉彦撰写的脉学著作,以四言歌诀的形式阐述脉学义理,对后世脉学有相当影响,《本草纲目》是明·李时珍编撰,载有药物1892种,收集医方11096个,绘制精美插图1160幅,分为16部60类,书中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通过对这些医著的翻译,向世人介绍了中医发展的思想和成果结晶,彰显了中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下转第950页)

关性^[6]。黏膜免疫系统按功能不同分为诱导部位和效应部位,二者主要通过淋巴细胞“归巢”发生联系^[7-9]。sIgA是黏膜免疫主要功能执行者。呼吸道、胃肠道分泌大量sIgA,是sIgA免疫反应的主要场所,同时sIgA也是联系各处黏膜免疫的共同分子基础。现代研究认为,胃肠道和呼吸道的黏膜都是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相互传变,这种黏膜免疫的物质基础是sIgA^[10]。人体肺、肠组织的正常功能与sIgA在消化道和呼吸道黏膜的功能相关。本研究所测定sIgA含量为呼吸道黏膜的主要物质。通过培土生金法治疗后sIgA在黏膜的含量增高,同时RRTI发病次数减少、症状得到改善。推测sIgA在肺肠组织中的特异相关性,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具体体现,同时sIgA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重要物质基础。

3.3 sIgA是“脾在液为涎”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问·宣明五气》指出“五液化液……脾为涎。”唾液为脾之精气上溢于口而成,唾液作为津液的一部分,除具有津液的一般生理作用和特性外,还具有重要的免疫功能,在机体抗病御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唾液中含多种免疫球蛋白、唾液溶菌酶、唾液黏液蛋白等免疫物质,在口腔防御系统、病毒感染及免疫疾病中至关重要。唾液是人体合成分泌最多的免疫球蛋白,是黏膜局部免疫的重要因素^[11]。一项研究证实,脾虚证患者的溶菌酶水平、唾液流量、唾液淀粉酶活性、淀粉酶分泌率、唾液SIgA等指标均出现异常变化,表明涎与脾功能的免疫相关性^[12,13]。本研究结果显示,唾液sIgA在培土生金法治疗后显著升高,推测培土生金法治疗缓解期RRTI肺脾气虚证患儿可增强口腔防御系统功能,提高机体黏膜免疫功能。

综上所述,唾液黏膜免疫在黏膜免疫系统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不仅对呼吸道乃至整个机体的免疫状态及防御机能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现代

免疫的深入,尤其是黏膜免疫的进展,已证实消化系统与呼吸系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同时中医药对黏膜免疫系统的积极调节作用也逐步被证实。本研究为中医经典理论“培土生金法”及其肺-脾-大肠之间的密切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随着今后研究的深入,中医药对黏膜免疫的调节为中医药防治疾病的机理探讨提供了一条新途径,为中医药防治黏膜相关疾病带来了希望。

参考文献:

- [1] 霍莉莉,虞坚尔,李利清.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发病机制的中西医结合研究[J].中医儿科杂志,2006,2(3):45-49.
- [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S].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6,8,20,21,23,29,33.
- [3] 国家技术监督局.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1997:39.
- [4] 小儿脾虚证诊断标准(草案)[S].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0,2:104.
- [5] 叶建红,杨宇,郑旭锐,等.肺与大肠表里关系的研究思路[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0,31(10):11-14.
- [6] 靳文学,杨宇.从黏膜免疫系统看肺与大肠相表里[J].四川中医,2005,23(12):1-21.
- [7] 王岚,易绍琼,高杰英.不同途径感染志贺菌小鼠黏膜免疫中的MAdCAM-1表达[J].现代免疫学,2004,24(2):137.
- [8] 杨辉,唐承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时肠淋巴细胞再循环的变化[J].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4,16(6):333-337.
- [9] 严兴科,王宇,张广全,等.肺与大肠相表里理论与研究进展[J].陕西中医,2003,24(4):378-380.
- [10] 周东浩,张蕾,周明爱.肺与大肠相表里今释[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9(8):567.
- [11] Tappuni AK. A comparison of salivary immunoglobulin A (IgA) and IgA subclass concentrations in predentate and dentate children and adults[J]. Oral Microbiol Immunol,1999,9(30):142.
- [12] 章永红.中医中药对32例胃癌血清溶菌酶水平的影响[J].辽宁中医杂志,1983,10(10):37.
- [13] 许永照.脾虚证免疫状态的研究[J].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4,27(4):38.

收稿日期:2014-04-26

(上接第915页)

3.3 加快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

从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中医文献整理来看,由于受到个人条件和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中医学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制约,所传播的中医理论不甚系统和完整,如所介绍的中药数量不多,也没有出现理法方药的系统介绍等,但是这个时期的中医海外传播,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在中国科技文化海外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中医的传播,改变了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医学的看法,让世人了解中医学在临床治疗上的时代先进性,加快了中医走向世界的步伐。中医学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医学宝库的财富,随着中医海外传播和交流的日益加强,必将

在为人类服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V)[M].法·杜赫德编,中·耿升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52.
- [2]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M].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279.
- [3]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II)[M].法·杜赫德编,中·郑德弟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305,308,310-311,308-309.
- [4]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影响[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8,115.
- [5] 张芝联.中法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47,55.

收稿日期:2014-03-13